

古越遗珍研究



王结华 毛颖 刘丽文 ◎ 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古越遗珍研究

王结华 毛 颖 刘丽文 著

科 学 出 版 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越王剑、会稽镜和越窑瓷是商周至唐宋时期越地人民创造的物质文化的典型代表。本书通过对越王剑、会稽镜和越窑瓷的综合研究，力图梳理出这些古越遗珍的渊源关系，还原出这些古越遗珍的历史原貌，并进而揭示出它们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

本书可供吴越文化及相关学科研究者参考使用，亦可供广大文物爱好者和收藏者参阅鉴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越遗珍研究 / 王结华, 毛颖, 刘丽文著. —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03-028815-8

I. ①古… II. ①王… ②毛… ③刘… III. ①文化史—研究—华东地区 IV. ①K2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68325号

责任编辑: 宋小军 杨明远 / 责任校对: 陈玉凤
责任印制: 赵德静 / 装帧设计: 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市京津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 787×1092 1/16

2010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14 3/4

印数: 1—1 500 字数: 335 000

定价: 180.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后 记

越王剑、会稽镜、越窑瓷，曾经闪烁着智慧光芒的高度物质文明，而今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古代越人遗珍，收集并梳理这些古越遗珍蕴含的文化信息与艺术内涵，融汇并撰写这样一本综合反映古越遗珍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的小书，曾经是我持之以恒的追求和持续不断的愿望。今天，在我进入昔之越地今之浙江工作、生活了7个年头之后，随着这本尚不成熟的《古越遗珍研究》的终于推出，多少也算是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

与我合著本书的另外两名作者毛颖女士和刘丽文女士都曾经是我在江苏镇江工作时的同事，然而现在三人却已是天各一方：我自己早于2003年秋调至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工作，毛颖女士也已于2009年正式前往南京博物院《东南文化》杂志社高就，只有刘丽文女士风雨不改依旧坚守在镇江博物馆。虽然分处异地，但因为相同的研究兴趣与相近的研究方向，所以我们选择了这样一个能够共识共鸣的研究课题。在此，我要真诚感谢毛颖和刘丽文两位女士，是她们的辛勤耕耘与不懈努力，并经过三人近3年时间的分工协作与统筹磨合，才最终催生了这本小书的面世。

我还要借此机会表示感谢：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元甫先生于百忙之中欣然应邀为本书作序；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所长褚晓波先生对本书的出版给予了充分的支持；镇江博物馆的袁瑛和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包慧英、张华琴、杨晓维诸位为本书文稿的汇集校对及图版制作提供了积极的帮助。科学出版社责任编辑宋小军、杨明远等人更是不辞苦累，为本书的及时编辑出版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值此书稿付梓之际，请允许我再次致以衷心的感谢。

当然，由于著者水平有限，书中出现的疏漏与谬误在所难免，尚祈行家批评指正，并请各位读者见谅。

王结华

二〇一〇年三月

序

于越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是一个有着鲜明民俗特征和独特文化内涵的民族，千百年间，他们在浙江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上，以其特有的文化渊源，营造出富有自己特色的文化类型，其所创造的灿烂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稽山鉴水，峰峦叠嶂；古越大地，朝霞夕晖。扑朔迷离的越国历史，底蕴深厚的越地文化，是中华文明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越王剑、会稽镜、越窑瓷……这些凝聚着越人智慧和民族精神的物质代表，使人向往，令人陶醉。

如今，一本厚厚的、散发着浓郁墨香的《古越遗珍研究》书稿已放在了我的桌上，这是王结华同志与其曾经的同事毛颖女士和刘丽文女士历时三载完成的学术论著。字里行间，流露出几位作者对古越文化的无限眷恋；广征博引，更表明了作者对学术的孜孜追求。捧读再三，爱不释手。

本书作者之一王结华同志原在江苏镇江博物馆工作，六年前调至浙江省宁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来甬工作后，在忙忙碌碌的行政和业务工作之余，也对古越和越地文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始潜心研究，笔耕不辍。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经过短短的几年努力，如今终有大成，合作撰写出了这样一本综合反映古越遗珍历史价值的学术专著，为古越文化和越地文化的研究献上了一份学术盛宴！我深为几位作者持之以恒的学术追求精神所感动，佩服他们在《古越遗珍研究》中凝聚的心血和付出的艰辛，也为他们在《古越遗珍研究》中所取得的成就感到由衷的欢欣和鼓舞。

青铜剑确实是古越人创造的最具代表性的物质文化，是越文化中的精髓内容。特别是以越王剑为典范的具王铭青铜剑，代表了越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是研究和揭示越国青铜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古越遗珍研究》一书在搜集整理出土越王剑和其他越国青铜剑材料的基础上，对越王剑的铭文书体、铭文内容、铭文特征、铭文成型工艺、铸造技术以及越国青铜剑的起源、演变与发展 and 越国青铜剑对其他地区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多视角全方位的综合梳理与深入研究。有材料，有归纳，有分析，有观点，可以认为，这是我所见到的最为系统、最为详尽地研究越国青铜剑的学术著作。

考古学文化是在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地点，由一定的人群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从研究内容上看，《古越遗珍研究》将越王剑、会稽镜、越窑瓷这三种不同时期的物质遗存，作为最具典型性的古越物质文化进行研究，显然超出了考古学研究的越文化时空概念，已属于越地文化研究的范畴。然而，由于某一民族或社会团体在某一历史时期所产生的一种文化，并不会因其政治或社会实体的消失而完全消失，它必然会对当地一定时空范围内的后续文化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这种泛文化式的研究也自有它的特殊意义，可以更加深

刻地揭示一种文化，或以一种物质文化为载体的民族精神的某种传承和发展，更可表现出文化背后所蕴藏着的伟大民族精神的经久不衰。譬如，汉六朝时期，特别是当魏晋南北朝时因北方地区的铜镜铸造质量下降、品种不多、很少创新，甚至于西晋末年后几乎濒临瘫痪，而被称为铜镜发展史上的中衰期的时候，以会稽山阴为代表的南方地区却成为著名的铸镜中心，以其独具特色的画像镜、神兽镜、龙虎镜等镜类和多姿多彩的私家作坊名号镜等为这一时期的铜镜发展史书写了重要的篇章。而此时会稽镜的异军突起、闻名中外，当与此前越国时期高超的青铜剑制作技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是古越遗民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冶铸技术新的杰出贡献；再如越窑青瓷与商周时期越地的原始瓷。原始瓷是于越民族的伟大发明与创造，也是于越民族具有特征性的文化内涵，而东汉以后出现的成熟青瓷，无疑是由原始青瓷直接发展而成，是原始瓷生产技术不断精进与提高的必然结果。可以这样认为，没有商周时期于越人创烧的原始瓷，就不可能产生汉六朝时期的成熟青瓷，更不会出现有“千峰翠色”之美誉的唐宋越窑青瓷。汉以后至唐宋越窑青瓷在原先古越大地上不断发展与大放异彩，正是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于越后人对传统制瓷文化不断创新与提高的一种体现。因此，把商周时期的青铜剑与后来的会稽镜，把商周时期的原始瓷与后来的越窑瓷作为越地典型的传统文化进行联系研究，更能体现出古越文化的渊远与流长；将越文化与越地文化联系研究，也更能揭示出古越文化的迷人魅力和越地深厚的文化底蕴，更能弘扬我们优秀的民族文化，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这正是《古越遗珍研究》一书在写作思路非常值得肯定的地方。另外，本书作者对于许多重要的学术问题，也在综合研究分析的基础上，大胆地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具有鲜明的学术观点。这些认识与观点，不少是真知灼见，有的虽然可能为一家之言，但也不乏闪光点，其学术勇气尤其值得肯定。

说实在的，我对书中所涉内容多无系统研究，也从未为人写序，只是结华同志再三希望我为他们的大作作序，实在难以推辞，只好勉而为之，写上几句。唯愿几位作者在今后古越文化研究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也愿《古越遗珍研究》一书在古越文化研究中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陈元甫

二〇〇九年六月于杭州寓所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绍兴绝对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一环；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绍兴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章。古代绍兴既是当年越国的都城、会稽的郡治和越州的首府，又是闻名遐迩的越王剑的渊薮之地、会稽镜的制作中心和越窑瓷的主要产区。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表明，以古代绍兴为核心的浙东宁绍平原一带人类活动与文明演进的历史迄今已近万年，从史前时代区系文化的自成一家，到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风骚擅领，再到秦汉以降地域文化的异彩纷呈，这里有着相对完整清晰而又特色独具的文化发展脉络和文化嬗变轨迹。千百年间，生活在这片美丽沃饶的土地上的古代于越族群及其后裔，与历史上不同时期陆续迁入的各地移民一道，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流传不息的物质文明与精神财富。

于越，又作於越、大越，简称为越。越的起源，历来纷争不一，未有定论，史籍所见于越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夏，确凿可信的越国的历史则始于越王允常，即春秋时期。《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云：“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时，与吴王阖闾战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践立，是为越王。”又《史记正义》引《舆地志》：“越侯传国三十余叶，历殷至周敬王时，有越侯夫谭，子曰允常，拓土始大，称王，《春秋》贬为子，号为於越。”越之疆域，初建时仅统辖以余望山（今绍兴附近）为中心的周边地区，春秋中晚期后越王允常“拓土始大，称王”。允常在位60余年，此后句践继位，《国语·越语上》记其时疆土为“句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据考，句无、御儿、鄞及姑蔑即今诸暨、嘉兴、鄞县（宁波市鄞州区）、龙游一带，范围大致包括现在的杭嘉湖地区、宁绍平原和金衢地区，并以太湖与吴为界¹。句践囚吴归越时，“吴封百里于越，东至会稽，西至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吴越春秋》），《越绝书》记为“东西百里”，其时疆域大约在钱塘江及其上游浦阳江南岸，包括今萧山、诸暨的一部分和山阴、会稽等于越部族的聚居中心。不久，吴王夫差又增越封地，《吴越春秋》卷八载：“东至于句甬，西止于檣李，南至于姑末，北至于平原，纵横八百余里。”至句践平吴称霸、迁都琅琊后，越尽占吴故地，东至东海，北至齐鲁，西到淮河流域与长江中游，南到江西乃至福建北部，越国疆域达到鼎盛时期。

¹ 《尔雅》：“吴越之间有具区。”

句践之后，越王朱句“灭滕”、“灭郯”（《古本竹书纪年》），越王翳“灭缙”（《战国策·魏四》），越之疆域在山东仍有扩展。然“翳三十三年，迁于吴”、“粤子无颡薨，后十年，楚伐徐州”（《古本竹书纪年·魏纪》），越在山东的势力被逐步削弱，江淮之地也因楚的扩张难以保全，不得不迁都至江南吴地。此后又因连续发生“越人三弑其君”事件（《庄子·让王》），越国国势日趋衰微。《史记·越王句践世家》载公元前333年越王无疆时，“楚威王兴兵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彼时越的疆域已一分为二，北方仍局促于山东琅琊一带，从无疆之子之侯到亲共历三代；南方则为浙东宁绍平原地区，即后来的山阴、会稽、诸暨、萧山、上虞、嵊县、新昌和余姚、慈溪、鄞县一带。公元前262~前252年间，楚考烈王并吞琅琊，“楚伐之，走南山”（《越绝书》卷八），北方越民渐次回迁浙东故土，但浙南山区、江西和福建的北部仍属越国的势力范围。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年），秦始皇使大将王翦平定江南，越君降秦，越国至此彻底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之上。越自立国至灭亡，前后延续凡一千八百余年，其间越人不仅谱写过“卧薪尝胆”的历史佳话，同时还创造了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尤其是以越王句践剑、越王者旨於赐剑、越王州句剑等具王铭兵器为代表的越国青铜兵器精良绝伦、举世无匹，在群星璀璨的中国古代青铜文化星河中焕发出炫目的光辉。

王翦平定江南，降百越之君后，秦以故吴越地设会稽郡，辖区北至长江南岸，南至今浙江衢州、金华、奉化一带，东至大海，西至今安徽芜湖、宁国、屯溪一线，辖有吴、曲阿、乌伤、毗陵、余暨、阳羨、诸暨、无锡、山阴、丹徒、余姚、娄、上虞、海盐、剡、由拳、大末、乌程、句章、余杭、鄞、钱塘、郾、富春、治、回浦二十六县，郡治在吴（今江苏苏州），曾经是越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绍兴不过是会稽全郡所辖二十六县中一个小小的山阴县而已。由于政治中心北移，于越部族流散，地域人口减少，生产趋于停滞，秦至西汉时期的宁绍平原一带社会与经济发展缓慢，越国故都绍兴（山阴）人口最多不过四万人，被《史记·货殖列传》描述为“地广人稀”之所，成为关东人口稠密地区移民的目的地之一¹。

东汉初年，由于“天下新定，道路未通，避乱江南者皆未还中土，会稽颇称多士”²。由于官僚地主举族入迁，显贵士庶接踵而来，会稽遂又“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³，一改之前“地广人稀”的落后面貌。同时，人口的增加特别是士人的入迁也带来了生产力的提高、经济的增长和文化的繁荣。东汉顺帝永建四年（129年），吴、会分治⁴，会

1 《通典》卷一《食货·田制上》：“至武帝，遂徙关东贫人于陇西、北地、西河、会稽。”

2 《后汉书》卷七十六《循吏列传·任延传》，中华书局，1974年。

3 《宋书》卷五十七《蔡廓传》，中华书局，1974年。

4 《后汉书·孝顺皇帝纪》。

稽郡大体以钱塘江为界分为吴、会二郡，会稽郡治迁至山阴，领辖山阴、余姚、上虞、剡、诸暨、余暨、句章、鄞、鄮、大末、乌伤、章安、永宁、东侯官十四县，广有今浙江省钱塘江、富春江、衢江以东及福建全省之地。政治地位的提升必然推动经济发展的提速，作为会稽郡治所在的山阴开始迈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据记载，分治后仅十二年的永和五年（140年），会稽郡守马臻即主持了鉴湖围堤工程：以郡城为中心，筑堤塘长达127里，在会稽山麓线以北、郡城以南筑成一片面积超过二百平方公里的人工湖泊，即鉴湖¹。湖周广三百五十多里，灌溉良田九千余顷，对当地的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会稽也由此一跃成为当时越窑青瓷的首创之地和铜镜工艺的制作中心。

东汉末季至三国之初，中原动乱，北人南向，遗黎播迁，会稽一带再度成为北方流民的重要移居地，孙吴政权中的许多官吏即多从江北南渡，著名的有张昭、全琮、周瑜、鲁肃、诸葛瑾、步骘、严畯等。同时，孙吴还不断向土著山越发起进攻，强令居住在深山的山越人和南逃的汉人迁入平原，编入户籍或征入行伍。会稽郡的人口借此得到较大幅度增长，尤其是南迁的北方士人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对本地经济的进一步开发和手工业的进一步拓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虽然孙吴之际的会稽郡设置时有改变，辖地也曾遭一步步削减，据洪亮吉、谢重英《补三国疆域志补注》所考，孙吴后期会稽郡仅统有山阴、上虞、始宁、余姚、句章、鄞、鄮、剡、永兴、诸暨十县，但尽管如此，以宁绍平原为核心的会稽郡，仍是其时江南最富庶的地区之一，尤其是铜镜与青瓷的铸造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俨然已经成为当时民间的普遍商品。

两晋时期，由于鉴湖水利工程的完成，特别是公元300年前后，晋会稽内史贺循又主持开凿漕渠，将原有的若干河道连接和疏浚，以满足灌溉需要²，北部山会平原得到迅速开拓，耕地扩大，农业生产大幅提高，手工业也获得快速发展，地区经济实力日渐雄厚。恰恰这个时候，中原出现了战乱，朝廷被迫南迁，大量中原居民随之而来，一些北方的显要家族如谢安、王羲之、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也纷纷举族南移，定居会稽³，涌入的平民必然更多，于是人口增长，需求增加，城市发展，市场兴盛，文化发达，各行各业迅速扩充，出现了“今之会稽，昔之关中”的繁荣局面。东晋咸和四年（329年），首都建康（今江苏南京）发生苏峻之乱，宫阙灰烬⁴，三吴人士甚至提出了朝廷迁都会稽的主张⁵，可见当时会稽的名望之隆，地位之高，已仅次于都城建康，以至于王羲之在永和九年（353年）三月三日发起一次兰亭修禊的聚会时，聚集的著名文人学士如王羲之、谢安、谢万、孙绰等多达42

1 陈桥驿：《古代鉴湖兴废与山会平原农田水利》，《地理学报》第28卷第3期，1962年。

2 《嘉泰会稽志》卷十：“晋司徒循临郡，凿此以溉田。”

3 《晋书·王羲之传》。

4 《晋书·诸葛恢传》。

5 《资治通鉴》卷九十四《晋记十六》。

人，文风鼎盛一至如斯。

南北朝时作为会稽郡治的山阴已号称“海内剧邑”¹。刘宋孝建元年（454年）以浙东的会稽、东阳、永嘉、临海、新安五郡置东扬州，州治就设在会稽²，山阴从一郡郡治成为五郡首府。刘宋大明三年（459年），又一度把扬州州治从原来的建康迁到会稽³。按：自晋建武东渡后，建康既为扬州州治，又是都城所在，故“扬州刺史为诸州统帅，多以上相领之，六朝皆然”⁴，而会稽膺此重寄，足见当时城市的繁华和地位的重要。虽然扬州州治旋即迁回建康，但会稽从梁代初年起，又被升格为东扬州⁵。梁中大同元年（546年）东扬州、会稽郡同治山阴。对此，清代学者全祖望曾解释道：“六朝扬州封内以丹阳为王郡，而吴郡乃其近畿，故多合二郡为扬州，而今会稽为东扬州。”⁶说明正是由于“会稽人阜物殷”⁷，使其俨然与建康东西相峙，成为当时江南的两大都会。同时，随着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会稽郡治山阴城市不断扩大，政事亦日益繁剧，最终在南朝陈时促成了山（阴）、会（稽）分治的实行⁸，郡城之内遂出现了一个郡治建置和两个县治建置的空前格局。

隋唐时期，改会稽郡为越州，隶江南东道。当时的越州不仅是一州首府同时也是江南东道的节度所在，俨然一大都市，成为全国著名的重镇。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年），又分越州立明州（今浙江宁波），辖鄞、奉化、慈溪、翁山4县。其时国家升平，社会稳定，文化发达，物足民丰，越地经济生产也因此得以再度繁荣和长足发展，特别是这一时期的越窑瓷业开始步入兴盛阶段，创烧出了驰名古今的秘色瓷器，青瓷产品不仅畅销内地，而且远销海外。

唐末五代钱氏建立吴越国，以杭州为西府，越州为东府，并数番进贡明州上林湖所产秘色瓷器于中原王朝，以期保境安民。北宋末年，金人入侵，偏都临安，史称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高宗赵构驻蹕越州，寓承继国统之意，于翌年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绍兴做了一年零八个月的南宋临时国都，行宫即在府治之内，宋《进士题名录一》云：“越今为陪都，要非余郡可比。”⁹陆游《嘉泰会稽志序》亦云：“今天下巨镇，惟金陵与会稽耳，荆、扬、梁、益、潭、广，皆莫敢望也。”越地政治之地位、经济之繁华与文化之发展至此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1 《宋书·顾恺之传》。

2 《资治通鉴》卷一二八《宋记十》。

3 《宋书·沈怀文传》。

4 （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补》，咸丰十一年五月十九日。

5 《輿地广记》卷二十二。

6 （清）全祖望：《鮑埼亭集外编》卷四十九。

7 《资治通鉴》卷一五九《梁记十五》。

8 （清）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九十二《浙江四》。

9 （清）杜春生：《越中金石记》卷四。

古代宁绍，以“越”为名；今日浙人，以“越”为荣。越地自商周至唐宋留下了浩如烟海而又风致殊胜的物质文化遗存，越王剑、会稽镜和越窑瓷无疑是其中最具典型性的代表，是古越先民为中国古代文明奉献的弥足自傲的物质遗珍。不仅如此，越王剑所蕴含的开拓意识与胆剑精神、会稽镜所昭示的文化意义与价值取向、越窑瓷所体现的创新理念与审美情趣，千百年来已逐渐融入古越人民及其后代的血脉之中，成为他们生存发展的精神财富和力量源泉。这，既是本书以越王剑、会稽镜和越窑瓷作为研究对象之目的，也是本书力图还归这些古越遗珍历史原貌之初衷。

序

导论

第一章 越王剑 / 01

第一节 存世越王剑 / 04

- 一、句践剑 / 06
- 二、越王者旨於賜剑 / 09
- 三、不寿剑 / 12
- 四、越王州句剑 / 13
- 五、不光剑 / 19
- 六、丌北古剑 / 23
- 七、其他越王剑 / 25

第二节 越王剑铭文 / 27

- 一、铭文书体 / 28
- 二、铭文内容 / 32
- 三、铭文特征 / 35
- 四、铭文成型工艺 / 39

第三节 越王剑的铸造 / 40

- 一、越国的冶铸业 / 41
- 二、越王剑铸造技术 / 42
- 三、铁剑技术 / 58

第四节 越国青铜剑 / 61

- 一、越国青铜剑的类型 / 62
- 二、越国青铜剑的起源、演变与发展 / 63
- 三、越国青铜剑的影响 / 72

第二章 会稽镜 / 75

第一节 会稽镜种类 / 79

- 一、博局镜 / 79
- 二、神兽带镜 / 82
- 三、画像镜 / 84
- 四、龙虎镜 / 92
- 五、神兽镜 / 94
- 六、四叶八凤镜 / 101
- 七、阳燧 / 104

第二节 会稽镜图像 / 104

- 一、六博与博局 / 104
- 二、伍子胥画像与汉代儒家学说 / 108
- 三、神人瑞兽 / 110
- 四、龙虎 / 117
- 五、佛像夔凤 / 119

第三节 会稽镜铭文 / 120

- 一、铭文种类 / 120
- 二、铭文书体 / 126
- 三、铭文体例 / 127

第四节 会稽镜铸造 / 130

- 一、冶炼技术 / 131
- 二、铸造技术 / 133
- 三、表面处理技术 / 137

四、迁移铸镜与标示原籍 / 139

五、三角缘神兽镜之探讨 / 142

第三章 越窑瓷 / 145

第一节 原始青瓷器 / 149

一、西周时期 / 150

二、东周时期 / 150

三、秦汉时期 / 153

第二节 东汉越窑瓷 / 155

一、瓷窑遗存 / 156

二、龙窑遗迹 / 158

三、纪年瓷器 / 159

四、器物特征与装饰风格 / 160

五、黑釉瓷器 / 161

第三节 六朝越窑瓷 / 162

一、东吴时期 / 164

二、西晋时期 / 170

三、东晋时期 / 176

四、南朝时期 / 182

五、器形演变与成型工艺 / 184

六、器物的名称与用途 / 186

七、关于堆塑罐的若干问题 / 187

第四节 唐宋越窑瓷 / 190

一、唐代 / 191

二、五代北宋 / 201

第五节 越窑秘色瓷 / 212

一、秘色瓷的出现、发展与衰落 / 212

二、秘色瓷的含义 / 215

三、秘色瓷窑场性质 / 216

第六节 越瓷的影响 / 217

一、对南北窑口的影响 / 217

二、对世界瓷业的影响 / 218

后记

第一章

越王劍

夏商周三代，青铜文化大放异彩。中原青铜器以其数量庞大、种类齐全、构思巧妙、装饰精美、铸铭记史、藏礼于器而呈现出无与伦比的魅力；各地区、各诸侯国的青铜器皿也各具特质、色彩纷呈。地处江南的越国虽然在青铜器的起源、数量、种类，特别是礼制色彩方面比中原各国甚至是相邻的吴国稍逊一筹，当中原王朝和其他诸侯国将彼时最为珍贵的材料用于铸造精美的礼器时，越国却不惜耗费人力物力用于制作武器和农具，充分反映出越人重视耕战的文化特征，并因此借其精良绝伦的青铜兵器，特别是以越王剑为最高典范的青铜剑，在群星璀璨的青铜文化星河中焕发出夺目的光辉。可以这样说，越王剑是越国青铜文明誉享名驰的鼎盛标志，代表了商周时期越国青铜文化的最高水平。

研究越王剑是揭示越国青铜文化面貌的重要一环，也是研究越国青铜文化不可或缺的一章。越国的物质文明特别是具铭文的青铜器和青铜剑，不但见诸古代方志的各种记述，同样也颇受19世纪以来各类青铜器图录或古文字著录的青睐，从收藏家到学者，从国人到外籍人士皆有所涉猎。如王懿荣《天壤阁杂记》，吴式芬《攷古录金文》，邹安辑《周金文存》，刘体智《善斋吉金录》，罗振玉《贞松堂集古遗文续编》、《三代吉金文存》、《小校经阁金文拓本》，于省吾《双剑谿吉金图录》、《商周金文录遗》，商承祚《长沙古物闻见记》，陈仁涛《金匱论古初集》，容庚《鸟书考》，孙稚雉《金文著录简目》，严一萍《金文总集》和英国人的《古代中国铜器》，法国人的《中华古青铜器集》，日本人的《书道全集》、《周汉遗宝》等均著录有越王剑等各式越国青铜器物。这些著录不仅仅是记录拓本、描述文字，而且有详尽的考订和研究，堪称洋洋大观。台湾古越阁王振华、龚钦龙等著名的收藏家也对越国兵器特别是越王剑情有独钟，收藏有越王州句剑、越王不寿剑等身世显赫、工艺精湛的越国兵器¹。

近20年来，对越王剑等越国青铜兵器的著录和研究工作更为全面深入，李学勤主编《中国美术全集·青铜器》，上海博物馆编写组《商周青铜器铭文选》，董楚平《吴越徐舒金文集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张光裕、曹锦炎《东周鸟篆文字汇编》，曹锦炎《鸟虫书通考》以及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金文引得》等书都著录了相当数量的越王剑。考古专家、科技专家、青铜器专家和古文字专家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对越王剑的类型、铸造、铭文、纹饰以及越国历史、越王世系等作了大量的探讨，有关越国青铜兵器特别是越王剑的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收获时期。

虽然著录、图录一直是保存和研究古代器物资料的重要手段与载体，但与之相比，考古调查和发掘无疑更具全面性和科学性。20世纪30年代，卫聚贤等创立“吴越文化史地研究

¹ 古剑：《〈台湾古越阁藏青铜兵器精粹展〉巡礼》，《文物》1995年第8期；南京博物院编：《台湾龚钦龙藏越王剑暨商周青铜兵器》，南京出版社，2003年。

会”，致力于调查越城遗址，开始了越文化的相关研究。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越国、越地及各处墓葬的相继发现与发掘，越国青铜兵器的研究亦步入了一个科学、系统的阶段，综合分析各地遗址、窑址、城址、墓葬及出土物所包含的文化因素和文化特征等构成了越国青铜兵器研究的坚实基础，也使全方位地揭示越王剑的历史面貌成为可能。

与邻近的吴国的王铭兵器和精品兵器多出于吴境以外一样，宁绍地区作为越国的中心，其所出兵器却并无极精之作，特别是较少具王铭兵器，且所出各类兵器并不能代表越国在各时期的主要兵器类型。越国青铜兵器中之王铭兵器和精品兵器亦随着越楚交锋、争霸征战和领土扩张等原因而多出于楚国境内及中原地区，尤以湖北、湖南、河南、安徽、山东等地为多。主要有：1965年湖北江陵望山1号墓出土越王句践剑¹；1974年湖北江陵张家山小墓²、1979年河南淮阳平粮台楚墓³出土、征集越王盲姑剑；1987年安徽安庆王家山战国墓出土越王无疆古剑⁴；1959年安徽淮南蔡侯产墓出土越王者旨於赐剑两件⁵；1973年湖北江陵藤店1号墓⁶、1977年湖南益阳赫山庙42号墓⁷、1980年湖北秭归香溪镇⁸、1987年湖北荆门子陵岗等地出土越王州句剑；1988年湖北江陵纪南城出土越王鹿郢剑⁹。特别是江陵作为楚故都郢城所在地先后出土了句践、者旨於赐（即鹿郢）、盲姑（也有学者考定为越王无疆）、州句四代越王宝剑各1件，且多出自大夫以下的楚墓。这4件具铭越王剑的发现，在学术界掀起了越国青铜兵器的研究热潮，内容涉及其类型、纹饰、铭文、合金、铸造等各个方面，特别是越王句践剑所采用的复合金属嵌铸法、菱形暗花纹、剑首同心圆等精湛高超的技术工艺所反映的科技成就，成为中国青铜器研究和科技史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课题。

1 湖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湖北江陵三座楚墓出土大批重要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2 《湖北省文物考古工作新收获》，《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3 曹桂岑等：《淮阳县平粮台四号墓发掘简报》，《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1期。

4 朱世力：《安庆出土之越王无疆古剑》，《故宫文物月刊》十卷十一期，1992年。

5 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淮南市蔡家岗赵家孤堆战国墓》，《考古》1963年第4期。

6 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藤店一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73年第2期。

7 文物编辑委员会：《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

8 杨权喜：《江汉地区发现的商周青铜器》，《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9 《中国文物报》1988年4月22日、11月11日。

第一节 存世越王剑

剑者，兵器也。《释名》：“剑，检也，所以防检非常也。又欽也，以其在身时，拱欽在臂内也。”剑是古代贵族和战士随身佩带用以自卫防身或进行格斗的可斩可刺的卫体武器，与刀、矛、戟、矢并称为“五刃（五兵）”之一。

剑在原始社会末期已经出现。据《史记·黄帝本纪》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管子·数地篇》：“昔葛天卢之山，发而出金，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此剑之始也。”银雀山汉简《孙臆兵法·势备》也有“皇帝作剑，以陈象之”之说。考古发掘也证明龙山文化时期确已出现有剑，山东临朐西朱封遗址出土有龙山文化时期的石剑，为青石质，中起脊，锋刃锐利，通长20厘米，宽约3厘米，已初具剑的形制¹。

商代是否有剑，尚无实物证明。但马承源先生在《中国青铜器》一书里认为，西周早期的剑体，与日本学者梅原末治《殷墟》一书中所载的骨矛形式一致²，因而不排除商代已经开始铸造青铜剑的可能。

西周时期特别是西周初期，中原地区的实战以车战为主，作为仅有十几厘米锋刃的短兵器的剑在实战中并不占重要位置。当时两军对阵时首先用远射的弓矢，战车错毂格斗时用长柄的戈、戟和矛、钺，只有双方战士扭打在一起时，剑才会起作用，但这种机会显然并不多见。但由史载可知，剑在西周初期确已应用于军队装备和实战之中，且形制也已成熟。

《史记·周本纪》载周军攻入朝歌后，武王“先入，适王所。乃克射之，三发而后下车，而击之以轻剑，斩之以黄钺，折县诸太白……散宜生、太颠、天皆执剑以卫武王。”考古发掘也不乏这一时期剑的实物出土，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墓出土了一件柳叶形青铜剑（报告称匕首），全长仅27厘米，细扁茎上有两个纵列的圆穿，应是在两侧附贴木柄，通过圆孔钉合起来使用³；同样的柳叶形剑也见于北京琉璃河53号墓⁴和陕西宝鸡竹园沟1号墓⁵。这些短剑有效使用锋刃不过17~18厘米，确实和匕首差不多。

西周以后，剑的地位有所提高，形制也由早期的扁茎剑变为柱脊剑。迄今发现的春秋早期剑都是柱脊剑⁶，剑体仍然比较短，一般为28~40厘米，有的有首、有的无首。只是

1 孙敬明：《先秦时期淮河流域的兵器》，《中国文物报》1989年6月23日。

2 马承源：《中国青铜器》，第7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沔西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62年。

4 琉璃河考古工作队：《北京附近发现的西周奴隶殉葬墓》，《考古》1974年第5期。

5 宝鸡市博物馆：《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考古》1978年第5期。

6 林寿晋：《东周式铜剑初论》，《考古学报》1962年第2期；《论周代铜剑的渊源》，《文物》1963年第11期。